

布依学研究

贵州省布依学会、安顺地区民委 编

要目

调整民族院校外语教学语种势在必行

布依族与夏文化

南笼起义 名垂青史

语言化石与民族文化

布依族的亲属称谓

布依语的「同义并用」结构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二重性说略

布依族地区市场经济机制探微

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对策和设想



贵州民族出版社

布依学研究

(之四)

贵州省布依学会、安顺地区民委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吕凤梧

布依学研究（之四）

贵州省布依学会、安顺地区民委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地质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250千字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412—0543—5

Z·38 定价：8.30元

编 委

顾问：王秉鉴 蒙素芬 罗尚才
王安泽 莫时仁 黄 瑶

名誉主编：王思明 侯绍庄 莫 健

主 编：伍治国 吴志平（常务主编）

副 主 编：伍昌恒 杨昌儒 金安江 周国茂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思明 侯绍庄 莫 健 伍治国 伍昌恒

吴志平 金安江 杨昌儒 白明政 周国茂

韦兴儒 伍文义 王芳恒 伍琪凯梦 王国勇

吴定川

目 录

伍治国：调整民族院校外语教学语种势在必行·····	(1)
王惠良：推行少数民族文字对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重大意义 ·····	(15)
郭厚方：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的重大举措：兴办高师预科班 ·····	(24)
王天佑：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的对策与措施·····	(27)
白明洋：试论民族教育立法的内容·····	(31)
郭堂亮：依法推行布依文教学，发展民族经济·····	(35)
张天路、陈秀英：布依族人口现代化与现代型民族繁荣探析 ·····	(43)
王国勇：走出贫困：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开发区战略 ·····	(52)
马启忠、王德龙：布依族地区市场经济机制探微·····	(61)
王科琼：市场机制下布依族经济发展初探·····	(69)
王廷琛：借他山之石，促自我发展·····	(80)
弋良俊：“借东风”，发展贵阳市民族乡村经济·····	(85)
蓝志昌、罗开平：马关县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前景·····	(92)
马国英：长顺县交通运输发展构想·····	(97)
杨文金：增强全民意识，改善生态环境 ——镇宁自治县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100)
班运秀：我省民族地区农村改水初探·····	(108)
王芳恒：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对策和设想·····	(116)

王克松：论布依族地区旅游景点的旅游市场·····	(127)
罗汛河：布依族地区旅游资源与经济开发展望·····	(132)
杨路塔：民俗旅游：匀城资源开发的一项系统工程·····	(142)
罗洪庆：开拓河口旅游事业发展民族经济·····	(147)
罗 漫：布依族与夏文化：论布依族先民的一支 属夏禹后裔·····	(151)
黄修义：南笼起义名垂青史·····	(184)
严英俊：试论南笼起义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197)
黎德荣：辛亥革命时期李友桃与扁担山的布依族农民·····	(203)
罗洪恩：少数民族档案史料及其文化功能试析·····	(206)
吴启禄：布依语的“同义并用”结构·····	(214)
伍琪凯梦：语言化石与民族文化·····	(232)
伍强力：活态民俗：一种有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	(240)
王 伟：布依族亲属称谓·····	(248)
王天锐：试论蜡染艺术与民族文化·····	(254)
王芳礼：从布依族《古谢经》看历史上各民族友好关系·····	(263)
李炳泽、伍隆萱：布依族吃狗肉源流探·····	(266)
吴定川：布依族地名初探·····	(269)
周国炎：越南北部的布依族及其文化·····	(274)
杨光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二重性说略·····	(293)
白明政：从民族地区贯彻执行继承法情况 谈民族继承立法的紧迫性·····	(307)
王殿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关键在落实·····	(313)
李向东：毕节地区少数民族干部情况调查与思考·····	(319)
王贤武：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医疗情况调查·····	(324)
向立富：民族地区卫生事业与经济发展关系之管见·····	(329)
后 记：·····	(336)

调整民族院校外语教学语种势在必行

伍治国

一、引言

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校教育，均包含有外语教学这一必需的内容。外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开拓本国国民的视野，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本国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奠定人文基础。然而各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所处的国际背景不同，以及传统的国际关系的差异，在外语教学语种的选择上自然会各不相同，教学语种的力量配备，各语种外语人才的培养比重也各不相同，从而构成了各国外语教学的特点。这些特点为了称谓的方便，应当称为“一个国家的外语教学语种构成”。

我国是世界大国之一，我国的对外开放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但是我国当前的外语教学无法完成沟通世界各国的这一严峻使命。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和民族差异都很大，各地区各民族对外开放的对象和任务理当各有区别，这也要求我国的外语教学应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随着超级大国主宰世界格局的崩溃，当今世界日益向多极化发展，这一世界形势在世界语文格局上也有明显的反映。1942年以前，科学论文中用英语写成的占44%，德语占13%，俄语占8%，西班牙语占5%，意大利语占4%。但是，到了80年代，德语、日语的比重日益上升，与此同时，英语的使用比重却处于停滞状态。从7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原先书不见经传的高丽语（朝鲜话）、暹罗语^①在世界贸易中崭露头角，而日语更进一步成了西欧发达国家的主要外语教学语种之一。目前，这一形势正在进一步发展之中。面对英语退潮，东方语种升温的世界语文格局，我们的外语教学语种构成显然也得有一个重大的相应变革，才能应付世界局势的巨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规划我国 90 年代的外语教学时必须面对世界局势和我国国情，认真地调整我国外语教学语种的构成，废除外语教学语种单方面倾斜的旧格局，才能满足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也才能发挥我国外语教学的潜在力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必需的外语人才基础。

二、当前我国外语教学语种构成的特点

我国外语教学语种构成的特点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负担。面对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要缓解这种负担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外语教学就将面临高投入少效益的危险局面。这种负荷反映在具体的外语教学上，则表现为我国当前外语教学语种构成上的四方面特点。

外语教学语种过分的单向倾斜，是我国当前外语教学语种构成上的一大特点。当前我国外语教学以英语为首选语种。这一状况本身并不存在任何弊病。因为英语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中介语言，英语的通行面几乎遍及世界各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必须以英语作为唯一的外语教学语种。事实上中介语永远代替不了其它具体的实际语言，一个国家为了满足和完成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不可能完全依赖一种中介语言去实现，它还必须

^①〔美国〕肯尼恩·卡慈纳著：《世界的语言》中译本第 288—289 页。

北京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版。

考虑准备其他语言的人才。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一点更显得非常重要。

当前我国从沿海到内陆 90% 以上的中学都只进行英语教学，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仅极少数中学的有教学班，至于像西班牙语那样通行于整个拉丁美洲的主要语种，在我国的中学教育中占不到 0.1 个百分点。可以说，我国目前外语教学语种几乎完全向西欧语言倾斜，特别是向英语倾斜。

我国的大学教育中，也以英语为压倒一切的首选语种，除专门的外语院校和外语系科外，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世界主要语种仅作第二外语教学使用，至于同样具有世界影响的阿拉伯语在我国的大学教学简直是屈指可数。这样教学的后果必然导致我国的大学生和研究人员，无法面对世界各发达国家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和民间的直接贸易。

一个国家对外关系中，与邻国的关系显然占有突出地位。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会把邻国的语言教学放到外语教学的重要地位，以保证本国拥用的外语人才，去满足本国与邻国之间官方与民间的交往需要。这种情况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我国则不然，与我国紧邻的外国语言除日语和俄语外，我们几乎没有成系统的规范化的教学机构。我国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山水相连，睦邻交往达 41 年。可是这些国家的国语越语、缅语、印地语、信德语至今没有列入中学教学内容，仅极其有限的外语院校才有极有限的学生攻读这些语言。菲律宾和印尼是我国隔海相望的邻国，他加禄语和印尼语同样没有列入中学教育的内容。日后若大规模地与这些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和民间往来，我国相应的外语人才又将从何而来呢？要知道外语人才的培养是个长期的教学过程，不可能靠突击来实现。要完成对这些邻国开放的实际需要，我们就必须从长远着手，把眼光放得长远些，及时开展这些国家国语的外语教

学。

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需要。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既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外贸的制约和垄断，又能满足平衡多极化世界的实际需要。为此，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中，适度增加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教学比重，同样是亟待实施的外语教学对策。阿拉伯语是世界的主要语种之一，也是中亚、北非重要的中介语之一。我国西北与中亚山水相连。加上宗教联系的缘故，我国有十个少数民族一直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密切的民间往来。在我国外语教学中提高阿拉伯语的教学比重，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我国外语教学中单一向英语倾斜，单一向发达国家语言倾斜，虽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却越来越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不利格局。及时地调整外语教学中语种构成，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我国外语教学语种的构成波动性很大。这是我国外语教学的又一特点。近半个世纪以来，曾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动。1952年以前，我们延续着旧中国的教学体制，以英语为首选外语，辅以德、法、拉等西欧各国语种，至于中亚、中东和亚洲各国语言，一般仅在特殊的高等院校才列入正规的教学内容。1952年后，由于我国与当时苏联的特殊关系，在以后院系调整中，俄语成了外语教学的首选语种，英语退到次要地位，不少英语教学人员改行学俄语。与此同时，在个别院校也增加了东欧各国的语言教学，如匈牙利语、波兰语、捷克语等，而对中东和亚洲各国语言除日语外，均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进入70年代后，英语重新成为外语教学中的首选语种，同时俄语教学受到了不应有的削弱。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误以为外语教学就仅是英语教学。与此同时，中东和亚洲各国语言同样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80年代中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单一的英语教学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对

内对外的开放需要，不少地区逐步恢复了日语、法语、德语的外语教学。然而这种逐步的改进，远远满足不了我国对世界各国开放的需要。立足于我国面向世界的客观实际，在规划“八·五”期间外语教学时，认真地反省一下我国当前外语教学语种构成的不合理状况，看来正当其时了。

自解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外语教学语种构成就经历了两次急转弯，从而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极大浪费，而外语人才的储备长期停留在供不应求的低水平上，一些与我国紧邻的外语语种教学长期处于空白状况。造成这种大幅度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以当时的政策倾向为转移，而对长远的后果缺乏顾及。外语教学是需要长期积累的活动，要储备足够的外语人才，决不能靠突击，而必须靠数十年的长期积累。50年代向俄语单方面倾斜，造成了我国英语人才的浪费和闲置，以致于影响了20——30年的英语教学水平难以提高。70年代后向英语单方面倾斜，同样造成了俄语人才的闲置，也影响了当今对独联体各国的开放。

造成我国外语教学语种波动大的另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关系一直以官方关系为主，很少考虑正常的民间交往需要。这样一来，有些国家曾经一度与我国关系十分密切，由于民间正常交往并不发达，因而这些国家的国语一直未排上我国外语教学的内容，仅在个别外语院校中的个别学生中展开相应的外语教学。比如，巴基斯坦其国语信德语就从来没有列入我国中学教材，在大学教育中接受信德语教育的人少得屈指可数。因为，我们仅满足于官方的交往，选用英语作中介语也基本上能完成翻译任务。因而在外语教学语种构成的波动中，这些与我国紧邻的外语语种被忽略掉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民间交往日益扩大，我国的外语教学为了面对复杂的世界环境，必然得要求多样化。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在考虑多样化教学语种的同时，还

必须考虑教学语种的相对稳定性，决不能根据一时的外交决策需要在外语教学中太起大落。从长远的需要出发，从民间交往的实际需要出发，我们的外语教学必须确保世界各国主要语种及我国的邻国的语种，在外语教学中维持相对稳定的比例，否则的话，瞬息万变的国际国际形势将不断地给我们出难题，使我国的外语人才储备长期处于贫血状态。

造成外语教学语种波动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外语教学计划缺乏辩证思想。不少人鉴于二战前后，英语在世界的中介语地位，误以为掌握了英语就可以满足技术引进的全部。这些人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原则问题，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语言的主流中介语地位，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各国势力间的消涨，主流中介语地位必然随之变化。历史上拉丁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汉语、梵语都曾经担当过世界或部分世界的主流中介语。因此，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单方面地向某一中介语倾斜，都会造成外语教学的隐患。目前，我国外语教学中的德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与我国外语教学中语种构成的大波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邻国国语语种人才的严重不足，也与我国外语教学语种构成的大波动直接相关。

由于外语教学语种的单向倾斜，同时造成了我国外语教学非层次化的特点。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区面对的国际环境差异甚大。东南沿海各省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以英、法、德、西班牙等语种为外语教学的主要语种，自然顺理成章，我国的东北、河北、山东等地，日语和朝鲜语的基础较好，在这些地区加大日语和朝鲜语的教学比重，同时降低欧美语种的教学比重，自然是明智的决策，我国东北三省与俄罗斯接壤，俄语教学基础十分厚实，加大俄语教学的比重，同样十分必要。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国西南各省区，由于与东南亚和南亚毗邻，在外语教学中忽视了这些邻国的国语教学，显然不能满足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

我国西北各省区与前苏联的哈萨克、乌孜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的国语已不再是俄语了，及时地将这些国家的语言纳入外语教学的内容，同样不容忽视。一句话，作为我们这样的大国，在规划外语教学时，不能千篇一律，必须立足于各地区的差异和外语教学传统的差异，应当各有侧重。造成外语教学语种构成上的层次变化，才能应付实际的改革开放。

然而，当前我国外语教学往往不问地区，不问传统，千篇一律地英语化，这不能不说是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的做法。

我国的外语教学缺乏针对性，这也是我国当前外语教学的又一大特点。为了科学资料交流的需要，外语教学自然得向欧美发达国家的语言倾斜。但是，科技交流所需的翻译人才必定是有限的，因而，向欧美发达国家语言倾斜得有一个限度，不能用欧美国家语言教学代替所有外语教学。因为，我们国家除了搞科技交流外，还得有民间贸易往来。为了满足民间直接贸易的需要，一些使用面虽然不广的语言，在我国外语教学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暹罗语，随着泰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随着澜沧江流域的国际开发付诸实施，我国却没有相应的暹罗语教学单位，显然不能满足民间贸易的实际需要。此外，缅甸语、印尼语、他加禄语都应当列入我国的外语教学内容。

面对多极化世界，一些离我们国家虽远，但拥有潜在实力的国家，出于长远的国际政治需要，我们也得考虑将这些国家的语言纳入我国外语教学的内容。比如，拉丁美洲通用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东非通用的斯瓦希利语，西亚和北非通用的阿拉伯语，我国都应当有一定比例的中级教学单位。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为我国储备不同语种的外语人才，才能满足我国长远的国际交流需要。

宗教交流也是国际交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为了满足宗

教交往的需要，一些与宗教联系十分密切的语言，我们也得考虑在我国外语教学中占有一定比例。比如，阿拉伯语、拉丁语、暹罗语、缅甸语、僧伽罗语都得占有相应的比例。

总之，我国的外语教育必须根据我国各方面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有针对性地满足对外联络的各项需要，安排不同的比例去进行不同语种的外语教学，以满足不同国际交往目的之需要。

上述四个特点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而言，实质上是四大方面的不足。在规划 90 年代的外语教学时，必须加快匡正，要完成匡正必须遵循一套稳定的指导思想。

三、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我国教学语种构成调整

要搞好我国外语教学语种构成的调整，我们决不能重蹈前 40 年的覆辙，来个大起大落和单向倾斜，我们必须有计划地、稳妥地、讲求实效地逐步完成这一使命。为了作好这一工作，我们就必须对我国的语言背景作一个科学的分析，确定在不同地区的调整目标，并通过科学手段逐步地加以实施。

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这里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除汉族外，在西南地区还生活着 30 多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母语分属两大语系和四个语族，属于汉藏语系的最多，有 20 多个民族，属于南亚语系的包括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属于汉藏语系的近 30 个民族中，又分别隶属于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属于藏缅语族的少数民族有藏、彝、景颇、傈僳、阿昌、怒、哈尼等 10 多个民族；属于壮侗语族的有壮、布依、傣、侗、水等近 10 个民族；属于苗瑶语族的则有苗族、瑶族等。^①

^①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第 257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 6 月版。

东南亚各国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谱系上的联系。比如，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和我国云南的阿昌族、怒族在谱系上就十分接近；缅甸的少数民族克钦族和我国云南的景颇族十分接近。泰国的主体民族暹罗族（泰族）、老挝王国的主体民族寮族与我国的傣族、布依族、壮族在谱系上也十分接近。此外，缅甸的少数民族掸族、越南的少数民族傣族和我国的傣族、布依族、壮族同样有着密切的谱系上的亲缘关系。我国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与柬埔寨的主体民族高棉族同样有密切的谱系亲缘关系。我国西南的苗瑶各族在东南亚各国也有近亲支系分布。

凡是在民族谱系上关系较近的民族，各自所操的母语必然十分接近，甚至可以直接用各自的母语进行对话。我国境内的傣族、布依族、壮族各自用母语进行直接对话，经过实际观察，事实证明是可以行得通的。西南民院、贵州民院、云南民院、广西民院、中南民院来自不同省区的布依族、傣族、壮族学生各自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对话，初接触时虽有一定的障碍，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一般都能顺利进行对答。事实上，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异比起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还要小得多。同样的道理，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暹罗族、老挝的寮族与上述三个我国少数民族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进行直接通话。我国出生于这些少数民族的驻外人员完全可以不用通过翻译人员直接听懂当地语言。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这种语言现象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虽然了解这一事实，但并未将它们的应用价值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认识水平也逐步深入。这样的语言现状不仅是一个纯客观的事实，而且是具有重大利用价值的语言人才储备，对我国培养相应的外语人才是个极大的人才宝库。

不仅壮侗语各民族是这样，其他语系和语族的少数民族也有

类似情况。我国云南境内没有经过任何学校教育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群众，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西哈努克亲王的演讲。我国的阿昌族、怒族前往缅甸经商，也不会有太大的语言障碍。至于我国的苗族、瑶族在东南亚的苗族地区，在语言上也是可以通行无阻。我国云南文山地区和贵州西部苗族能完全听懂东南亚各国的苗语和瑶语广播。

当我国的外语教学单方面地向英语倾斜时，上述各种语言的通话实况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当我国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外语教学语种向多样化发展时，这些语言的通话实况就会成为有价值的人文资源财富。我国要对东南亚开放，就得有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的人才储备。东南亚仅半岛部分的五国：老挝、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面积近 2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一亿四千多万人（80 年代初统计数字），加上这些国家都是我国的近邻，要对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的官方和民间交往所需的外交翻译数字必然十分庞大。培养这些国家语言的翻译人员，就得让我国的部分学生从中学开始就接受这些国家语言的教育，在高等院校中也得维持相应的学生继续深造这些国家的语言，才能保证我国有足够的翻译人才储备。在我国未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以前，这种语言的人才奇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现在随着我国西南边疆陆路口岸的对外开放，翻译人员的缺乏一下子推到了我们的鼻子底下，这需要我们作出迅速的反应。将这些国家的语种纳入我国中学到大学的外语教学内容。这样的反应，一是目前形势所迫，二是匡正我国外语教学单向倾斜的弊端。

开展这些国家相应语种的教育，既然是形势之需要，作为教育部门就得认真考虑教学投资与成效这一重大问题。如果让汉族学生来接受这些语言的外语教学，其投资与成效同学习西方语言的投资与成效比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如果让我国相应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国家外语语种，则会事半功倍。因为这些民族的

母语与这些国家的语言是近亲语言，语法规律几乎完全相同，词汇系统中同源词占 10%——70% 之间，语音之间对应规律很强。因而只需经过短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很快地掌握这些国家的语言。

比如泰国国语暹罗语，使用人数多达三千余万人，在中印半岛西部已成为跨国的中介语，将这种语言列入我国的外语教学是完全必要的。加上这种语言的通话地区都是我国西南的近邻，精通该种语言的人才所需数量，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得维持在上千人左右。接受这种语言教育的就得超过万人。要造就这样多的暹罗语人才，暹罗语不进入我国外语教学显然是不行的。现在的问题上，应当如何选定接受暹罗语教育的对象，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中接近暹罗语的有布依语、傣语和壮语等语种，使用这几种语言的人数在我国有二千余万人，其中能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将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近 600 万人。如果对这 600 万人中的中小学生都以暹罗语作为外语教学语种，那么接受这种外语教学的人也不过 100 万人。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地区的学校教育还十分落后，目前能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比例还相当大，真正能够在中学阶段有条件接受暹罗语教育的人数绝对不会超过 20 万人，即使这 20 万人都接受了暹罗语教学，该语种的翻译人才也绝不会有多条。据此，我们认为在这几个民族中条件具备的地区，从中学阶段开展暹罗语教学，并将该语种列入高考考试外语语种之一，是完全必要而可行的。

与此同时，也应当在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的中学生中选定高棉语作为外语教学对象，而不必强行要他们选学英语，并将高棉语也列入高考考核语种。同样是利国处民的教育改革之举措。类似的情况还有滇西的藏缅语族各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缅语克钦语教学，同样是适时合理的。

在我国西南地区相应的少数民族中学生中，选修东南亚各国